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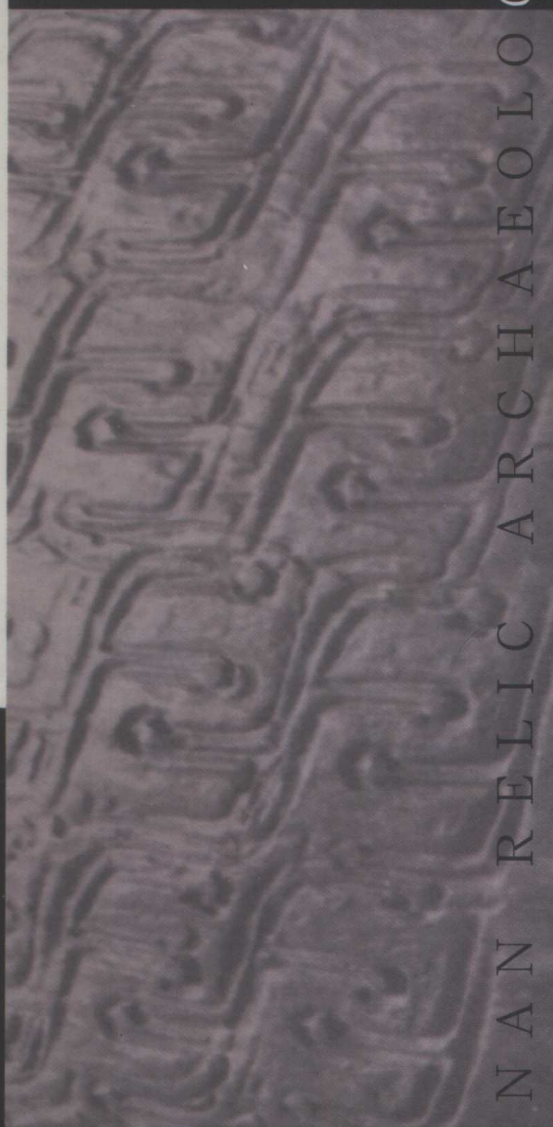


广东省博物馆丛书

LING NAN RELIC ARCHAEOLOGY PAPERS

岭南文物考古论集

杨式挺 著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岭南文物考古论集/杨式挺著. - 广州: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1998. 11

ISBN 7 - 80522 - 497 - 8

I. 岭… II. 杨… III. 文物 - 考古 - 广东 - 文集 IV. K872.
6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0052 号

岭南文物考古论集

杨式挺 著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彩印厂印刷

(社址: 广州市环市东路 468 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5.5 字数 560 千字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522 - 497 - 8/K·774

印数: 1000 册 定价: 68.00 元



作者简介

杨式挺，男，汉族，1932年生。福建省泉州人。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先后在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前身）、广东省博物馆从事田野考古调查发掘研究及文物、博物馆工作。历任考古组组长；广东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副队长、研究室主任、副馆长。现职研究馆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广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著作有《中国文物地图集·广东分册》（合作）、《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合作）、《简明广东史》（合作）、《广东通史·古代上册》（合作）。发表学术文章70余篇。

岭南考古开题

——杨式挺《岭南文物考古论集》序

1996年新年刚过，我应香港商务印书馆陈万雄总编辑之邀，到南方新兴开放城市深圳工作一段，见到广东的许多老朋友，总回想到20年前那段难忘的日子。

那是1975年11月到第二年4月我在广东近半年，由杨式挺同志陪同，先在石峡工地看石峡遗址墓地新发掘材料，又到省博物馆库房看多年积累的省内几十个地点调查发掘材料。那次主要收获：一是认识到广东古文化不只是砂陶、软陶、硬陶的笼统概念，而是有自己的青铜时代，有自己的夏商周；二是广东省东西南北中五块有所差别，要区别对待，有关情况已写进《石峡文化初论》，于1978年在《文物》第7期上发表。20年过去了，中国考古学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岭南考古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们不妨进一步提出问题。我们曾经说，石峡虽小，干系甚大。它是透视南北的窗口，向北可以看到中原，向南看到的是岭南的一片新天地：一、石峡墓陶器的组合是盘鼎盘（盘式鼎和盘）、豆盖豆（豆和盖豆）；二、大量使用“十字镐”（石耒），这适合于开垦南方的红壤土；三、有肩石器、有段石铤发达。四、珠江三角洲一带也有新石器时代较早的遗存，南海西樵山是一处很有希望的大遗址，可能包含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早晚不同时期的遗存。打制、琢制的石器大量存在，可惜缺乏进一步分析的条件。佛山河宕遗址的时代约与石峡相当，但没有看到时间较早的青铜器。可是汕头地区的饶平发现了相当早商时代的铜戈、玉戈、石戈，还有釉陶尊。韶关地区和汕头地区出土的石戈，从最原始的无阑戈到有阑的戈，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是中原所没有见到的。我的这些初步看法，发表于《文物》1981年5期《关于考古文化学区系类型问题》一文中。以上这些都是岭南文化的特色。岭南文化的形成不是秦汉设郡以后的事，没有当地的“古文化”、“古城”、“古国”，设不了郡，就是秦汉设郡以后也有“外来文化”地方化的问题，这使我真正感到了岭南的“更加郁郁葱葱”。岭南与一般的南方有所区别，它既不同于太湖流域，不是吴越文化，也不同于长江流域，不是楚文化，与江西也有个界限。它南连着南洋诸岛、印度支那地区，是陆地一半海岛一半连成一片形成的一个大区，代表着大半个中国，是真正的南方。从更大范围看，有肩石器从岭南向西经云贵高原直到印度河，欧亚大陆古文化在那里分界，有段石铤则联系着环太平洋地区直到新西兰岛，中国大陆与印度次大陆和环太平洋地区的文化关系都同岭南有关，可见，岭南考古是个大题目，可以越作越大，愿与杨式挺同志和广东省的朋友们共勉。

苏秉琦

1997年元月于寓所

岭南考古论题

——杨式挺《岭南文物考古论集》序

广东省博物馆杨式挺先生近日彙集他若干年来著述、论文汇为一编，以余早岁从事方志工作，不以衰朽冥顽见弃，嘱为嚆引，不辞固陋，谨缀数言弁于其端。杨君从事考古专业多年，多所创获，细读此书，其特色有三：（一）每涉一专题必作综合性的全面考察；（二）必引征文献史料，故所论皆信而有征；（三）必原始要终，细加辨析，以求其是。综此之长，信足为来学典范。

窃有二、三问题，久梗胸中，愿借此拈出，以供讨论。一、出合浦县西汉大墓的“劳邑执刼”一印，杨君据《汉书·地理志》断为朱卢县应在合浦（见本集《“朱卢执刼”银印考释——兼论朱卢、朱崖问题》一文）。按《水经·郁水注》：“郁水又东迳高要县，牢水注之，水南出交州合浦郡治合浦县，汉武帝元鼎六年平越所置也。……牢水自北流迳高要县入于郁水”。

《汉志》合浦郡临允下云：“牢水北至高要入郁。”杨守敬谓牢水今日罗银水。出新兴县西南东北流至高要县南入西江（参看《水经注疏》卷6，江苏古籍出版社印本页2993）。余谓劳、牢同音，劳邑可能因牢水而得名，劳邑所在，可提供一线索。

二、《水经·注水注》：“注水……又迳博罗县西界龙川，左思所谓‘目龙川而带垆’者也。赵佗乘此县而跨据南越矣，”左思语出《吴都赋》，佗秦时曾为龙川令。《注水注》记尉佗墓甚详悉，引裴渊《广州记》：“城北有尉佗墓，吴黄武五年，孙权使治中从事吕瑜访凿佗墓，自天井至北山，……卒不能得”。《御览》五三引裴渊同记：“城西北五里连续大岗直上百寻，名为越王冢。吴朝掘尉佗墓竟无所见，于天井岗得六玉玺。”是佗墓吴时发掘实况如此。考《元和郡县志》岭南道南海县下云：赵佗故城。……尉佗墓在县东北八里。又言：佗葬在禺山，葬与此相连接耳。

又《郡县志》十七河北道真定县下云：赵佗墓，在县北十三里。……文帝为其先人置守冢，昆弟在者存问之。

此叙唐时佗原籍真定有佗之墓，当是后来衣冠冢，佗无由返乡立冢也。而禺山之冢，亦复扑朔迷离。近日广州市忠佑大街掘出南越国官署遗址，有斗大“蕃”字大篆，刻于铺砌石板之上。是否属佗时物，尚未能定。论者谓是南越国官署遗址之一部分。按御览一七二引《广州记》，尉佗筑朝台以朝天子。又引《南越记》：“朝台下有赵佗故城。朝台西三十里即岗旁江，构越华馆以送陆贾，因称朝亭。”带“蕃”字铺砌，与朝台有无关系，正有待于寻证。

三、刻划于陶器上之符号，为江南地区百越史前文化之共同因素，广东亦然。始兴白石坪、饶平浮滨、曲江石峡、佛山河宕等处皆有刻划陶片。杨君撰《试从考古发现探索百越文化源流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提出肩斧、段斧（铍）、石钺诸器流布及于海外

印支半岛。此事日本及菲律宾考古家讨论至繁，孰先孰后，目前仍难遽下断语。所谓百越，实不限于两广，（四川）宜宾亦出肩斧、段斧（铍）。远至西南云贵高原，亦有越人足迹（参看汪宁生文、载《百越民族史论集》页231；拙作《选堂集林·史林》页1399）。1963年，我在印度蒲那（Poona），研究 Indus Valley 的图形符号，涉猎印度地区考古书籍，始知肩斧、段斧亦密布于印度东部 Assam 及 Bengal 山区地带，考古学者 Bridget 辈都承认在新石器时代受到中、缅的影响。余曾举出印度 Rangpurn 出土陶文与（广州）华侨新村陶符雷同之例（参看拙著《梵学集》页353—370，上海古籍出版社印），百越常见之 II、III、X、X、↑ 诸符号均见于印度等地。《华阳国志·南中志》记“永昌有闽濮、鸠僚、僮越、裸濮、身毒之民，”印度人久已侨居于滇越、僮越即缅甸。故余认为古代越族文化侵入印东，似为不争之事实。所谓“越”者，其分布至广，可能远及于南亚，此一崭新主题，有需要继续深入探讨，一向未有人注意及之，故为提出，以质正于高明。

以上三点，略摭所见，幸垂教焉。

赋词一首：

夜 飞 鹊

绸缪岭南事，稽古年年。石峡稻粒依然。西樵踟躕贝丘地，拔牙证俗开先。低徊牛围墓葬，更杏花河畔、鹿尾村前。象冈废畹，起嵯峨、南越新阡。

无数新知收获，足锄经订史，直缀陈编。犹记尉佗踰岭，上书求女，为卒补氈。兰珠余韵、抚铜弩、意极缠绵。愿从君问故，花间量屐，酒后摊笺。

〔附注〕近时香港重要发见，有拔牙头骨，足证其先民为古越人。尉佗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见《淮南传》）。蛮王女兰珠精制弩，佗遣子贲其家（见《粤娇志》）。

吾粤西汉末叶，有经学家陈钦父子。封开遗物出土，方悟其文化渊源之远。拙句杏花河，因其字面甚雅，用之倚声亦自恰当。弟近著《符号初文与字母》（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论越系陶文仍坚信印度东部 Rempur 之符号，应属百越一系，望兄有以论定之。

饶宗颐

1995年12月于香港

勤于实践 勇于探索

——杨式挺《岭南文物考古论集》序

杨式挺同志把他从事考古工作近40年来的成果辑录成集，令我十分欣慰。这不仅由于我们是老朋友和校友，并同在一单位共事数年；还因为本书的出版，堪称为广东考古界第一部资深专家的文集。可喜可贺，是故不揣浅陋，为之介绍，使读者更多地了解作者与著述。

我与式挺同志相识于1958年秋。我们同时从北京大学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即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前身）。我研究的学科主要是中国近代史，他则是考古专业的五年制本科毕业生。甫抵单位，即卷入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热潮。几近沸腾热度的政治学习会上，中心议题是我国是否已向共产主义过渡。尽管如此，在德高望重的杜老（国庠同志）领导下刚刚正式建立的这个研究机构还是启动了科研工作。为了更进一步培养初建的考古队伍，1959年夏，式挺同志等考古组八人就被送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和河南、陕西等地的有关单位进修和参加发掘。1961年，返回广州的式挺同志等当即开展了广东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而在制订科研规划时，式挺同志提出了颇为中肯的主张：把“立足广东，面向全国，兼顾东南亚”作为方向，专业的重点则放在广东、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下迄先秦）考古。他们那时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加之发掘工作本身又是体力劳动，口粮和衣裳均感匮乏，式挺同志却从无怨言。后来，他与考古组的几位成员调到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同事之缘虽未再续，学术活动还是一条联系我们的纽带。他后来兼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与历史研究所的同志们共同编著《简明广东史》、《广东通史》（古代上册）等学术活动，过从较多，我也时得向他请益。

40年就这样过去了，中国经历了多少曲折和顿挫。当年20初度，于今年逾花甲。然而，使我深感慰藉的是，式挺同志始终锲而不舍，孜孜以求，为考古事业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和精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部文集，则是他的学术建树的一个方面的反映。

文集具有鲜明的优长和特色，体现了作者颇为深厚的理论素养和业务根底。他始终坚持严谨的学风和文风，勇于探索和开拓。同时，在研究实践中把明确的主攻方面和广阔的视野结合起来。这部选录了式挺同志大部分力作的文集，突出的优长和特色之一即为科学的理论、方法论的指导。作为一位考古学家，式挺同志当然懂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意义，从5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一直在发掘、整理的第一线工作。但是，他又非常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强调理论与实际工作的密切结合，而不满足于对遗址、遗迹和遗物的断代和描述。他力求扩展工作的学术和社会意义，希冀藉助科学理论的指导得以更好的阐明当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有关问题。他的许多著述对史前史作出了贡献，《试论西樵山文化》、《广东新石器时代文化及相关问题的探讨》、《百越文化源流的若干问题》、

《从考古发现试探我国栽培稻的起源演变及其传播》等论文即为实绩。并有多篇被评为广东省社科优秀论文及被译为英、日文。作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且从当代卓有成就的考古学家（如夏鼎、苏秉琦等）的优秀著作中汲取理论思维的营养。显然，这是难能可贵的。科学的理论的指导，无疑是我国社会科学的根本优势所在。

其次，把考古学——特别是史前考古学的最终目标确认为恢复没有文字的史前史，亦是这部文集的优长与特色。在一定的意义上，作者把考古学理解为广义的历史学的组成部分。但他又明确指出前者并非仅是后者的注释，而是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有其自身的任务和方法论，即考古学科本身及其考古学文化。作者的一些论文，就是探索考古学文化的。以典型的有自身特征的遗址、遗迹和遗物为依据，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研究，重建岭南史前史、先秦史，这是作者多年来的思考和实践。他对广东远古历史的研究、确是有益的尝试。这决不是对史学家的越俎代庖，而是考古学家的因利乘便——对于史前研究的重要素材（遗址、遗迹和遗物），考古学家显然了解得更为具体和深切。

再次，积极地、多元化地为现实服务，构成了这部文集的又一优长和特色。作者不为考古而考古，不把研究工作局囿于遗址、遗迹和遗物的断代、排比及描述，又不高居于象牙之塔，而是不拘一格地充分发挥考古学的社会功能。作为资深的考古学家，他为各类地方史志的编纂服务，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大业服务。他一向弃摒实用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不允许把为现实服务庸俗化为牵强附会。他的《从考古材料看香港与内地的历史关系》、《“大湾文化”初议》、《香港古文化的根在大陆》、《略论澳门黑沙史前文化与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的关系》等文章，就密切配合了祖国统一进程的重要步骤。无可置辩的事实是：学术不应从属于政治，但也不可能脱离政治，社会科学为现实服务乃是它的崇高职责。

综观全书收录的各个时期和不同内容的论文，深感作者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反复推敲，认真琢磨，乃是作者崇奉的学风与文风，并且体现于他的科研实践。式挺同志的功力深厚的、言之有物的成果，实际上亦是对当前学术界存在的那种浮躁的、急于求成的、哗众取宠的不良学风与文风的抵制。

由于年龄的关系，式挺同志近年来离开了领导岗位，也较少到考古工作的第一线去，但他依然奋进不已。继续参加编写考古报告和撰写文章，参与各种学术交流和研讨，担任许多学术团体的重要职务，参与社会活动……。他在我的印象中并没有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精神面貌方面。我们在实践中取得了一个共识：坚持理想和信念，不停顿地工作，衰老和死亡的阴影，就决不会笼罩你的身心。一个真正学者的生命句号，应当画在书桌前面。

热切期待式挺同志多作贡献、长作贡献！

让我们用实绩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张 磊

1998年5月于广州

自序

每当我想到已是年过花甲时，便有编个文集的愿望。祈望给社会留点有益的东西。

本《论集》的文稿，虽然已发表过，但作为结集还是首次，不与人比与己比，掬杯清茶表心意。由于文稿先后发表的时间相隔日久，又较分散难查，有一些年轻同行曾好意来函索取，这也鼓起我出本《论集》的勇气。

本人是一个文物考古工作者，首先应当做好文物的调查、发掘和编写报告工作，写论文似是业余的事，但必定与专业有关。所以想借此机会，回顾自己在广东做过哪些文物考古工作，对我为什么撰写这些文章或许会有所了解，对自己可以温故而知新，对以往在工作中和写作中曾帮助支持我的领导、师友和同行，借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1958年秋，我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分配来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广东省社科院前身）历史研究室工作，当时研究所的领导是准备筹建广东省考古研究所的。翌年5月成立考古研究组（任组长），共有8人，即被送去北京、河南、陕西等地进修学习和田野考古实习。1961年春回所，开始了广东的考古。首先是到梅县、大埔调查。1961年9月和1962年9月，分别参加广东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由莫稚副队长领队的增城县金兰寺古遗址和增城西瓜岭古窑址的发掘。金兰寺贝丘遗址首次发现了“三迭层”：上层为含米字纹陶的战国文化层；中层为含几何印纹陶和有段石铤的新石器末期文化层，在中层的2A层清理的四具人骨架中，经鉴定有一例人工拔牙男性个体，是广东最早发现的经鉴定的拔牙个体；2B层发现有一个“陶祖”，在紫金县在光顶遗址也有发现。祖（且）者，乃父权制社会男性生殖器崇拜物也。2B层测定年代为公元前 2495 ± 145 年（已校正）；下层为含夹砂陶、泥质陶、彩陶和少量有肩石器的新石器中期文化层。该处“三迭层”的发现，得到了夏鼐所长的肯定。增城西瓜岭窑址是一处战国时期窑址，出土了一批米字纹、方格纹、水波纹的陶器群。可惜当时没有坚持把迭压在窑址之下的出有云雷纹硬陶和青铜刮刀的文化层划分开来，可谓是一件憾事。

1963年4月，我们考古组合并到广东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一直是从事田野考古工作。30多年来，本人先后参加过全省（含海南岛）多数市、县的调查发掘工作。比较主要的有：曲江县马坝等地洞穴、山岗、台地的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器遗址的调查，尤以1973—1978年间在马坝石峡遗址的发掘最为重要。石峡遗址约三万平方米，发掘近四千平方米。发现了包涵从六千年至两千多年前的四个不同时期文化遗存。特别是发现一百余座富有地方特色的新石器晚期墓葬，命名为“石峡文化”，得到了国内外考古学界的认可。在最下层（“前石峡文化层”），发现有经专家鉴定的“木骨泥墙长屋”遗迹及距今六千年左右的人工栽培稻遗迹。1974年到始兴县调查玲珑岩，发现新石器早期的陶器和半磨光石器遗存；在附城中镇村试掘，发现与石峡文化有关的遗址；在

澄陂村发现与石峡中文化层同类的窑坑；在窑坑底下的细沙层里，发现一件瓜仁形打制石器，苏秉琦教授认为是新石器早期——中石器时代遗物。在顿岗乡等处调查了先秦两汉遗存。尤其是在城郊赤土岭、禾场岭、死蛇岭等处抢救清理 85 座东晋、南朝、隋、唐砖室墓，出土一批青釉瓷器、青铜器和铁器。1976 年冬至 1977 年春在佛山市郊河宕旧圩贝丘遗址发掘 760 平方米，发现新石器末期（距今约 4300—3500 年）遗址和 77 座墓，人骨架大部分保存较好，是珠江三角洲发掘数量最多的一处墓群。是时适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老所长尹达同志来现场参观视察，本人向他请求北京考古所派人来协助鉴定保护。因而佛山河宕墓葬的大部分人骨的性别、年龄、身高和体质形态（蒙古人种南亚类型）得到了科学鉴定，还发现有 19 具男女个体生前有人工拔牙习俗（同类种属的人骨、拔牙个体在南海灶岗，鱿鱼岗贝丘遗址也有发现）。由于河宕遗址墓葬出土的一批花纹精致发达的印纹陶器、双肩石器、象牙器和骨器装饰品等，在珠江三角洲新石器末期文化遗存中具有典型性，可称之为“河宕类型”文化。1978 年以来，参加过顺德县大良、勒流、杏坛、均安等地两汉、唐宋遗址和墓葬调查发掘。表明杏坛逢简、勒流沙富等地有西汉早、中期的遗址和墓葬，他处则以东汉墓居多。相传南越国相吕嘉等人曾在石涌（石瓮）、金陵筑两城以抗汉军，吕嘉与南越王赵建德从此兵败逃匿。此事值得置疑，因为在那里一带调查的遗址墓葬均属东汉而非西汉。顺德迄今似未发现过新石器时代遗址，它与邻境南海、佛山发现有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存有别。又如对原省文物保护单位永安岗新石器遗址进行复查，仅见夔纹陶片和汉代陶片，未见新石器时代遗物，这种情况恐怕与顺德县的冲积平原形成较晚有关。1983 年以来，参加过封开县杏花河两岸数十处山岗调查试掘，较重要的发现如鹿尾（禄美）村对面山发现一座“石峡文化类型”墓葬，猛虎头山一座春秋晚期残墓有青铜鼎和完整印纹陶瓮，牛围山发现 7 座（个）春秋“瓮罐葬”，杏花河两岸出土有珠江三角洲型的双肩石器、桂南大石铲和 300 多个夹砂三足鼎足。1989—1990 年在南丰镇郊利羊墩基建中领队抢救清理 55 座古墓。其中 40 座为战国至西汉前期土坑墓，约近三分之二设有“腰坑”，出土一批印纹硬陶、原始瓷、青铜器和几件铁器，还有一批陶器带有刻划记号，是粤西地区发现数量最多的一处战国西汉早期墓葬。1983 年 10 月至 1984 年底，参加广州象岗西汉南越王墓的发掘、整理和编写工作。南越王墓的发现被誉为岭南考古的重大发现，在全国发现的西汉墓中亦属佼佼者。出土的一千多套（件）金、银、铜、铁器、印玺、玉器、象牙、象牙器、丝绸、漆器和漆木屏风等，极大地丰富了对南越国史和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研究，它印证和补充了《史》、《汉》的记载和阙如。广州（古番禺）建城有二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就是由该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龙纽金印和一套铸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铭文的青铜礼乐器推定的。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文物可以创史之无、补史之缺、证史之误，其价值由此亦可见一斑。

此外，1982 年以来，参加过曲江、始兴、南雄、英德、封开、揭阳、普宁、潮阳、湛江地区、深圳、珠海、中山、新会以及海南岛儋县、陵水、崖县等市县文物普查并举办过培训班。1985—1988 年参与广东省文化厅主编的《中国文物地图集·广东分册》的编制工作（主要编制古遗址和古墓葬两大类）。1985 年以来，有幸应邀为全省（含海南岛）约 50 个县、市的《文物志》审稿，篇幅达 500 余万字。在编审中，提出了“抓住

重点、突出特点、照顾全面、符合体例”四句话、十六字的编纂原则。通过它不仅使自己从中受到教育，也因此有机会更多地了解和接触到那些市县的历史沿革、地理形势、生态环境、文物分布和保存现状等，从而弥补未能亲自到一些市县调查发掘的缺陷。1984年以来，参加了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主编的《简明广东史》及《广东通史》（古代上册）两书中的史前、先秦篇章的执笔。该篇章是以考古文物资料为主、文献资料为辅，在历史唯物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下，为重建广东史前史、先秦史的一种尝试。

如上所述，或许可以说，象我们这一年阶的文物考古工作人员，一生能在一个省从事30余年的文物考古工作，能有机会参与若干重要考古遗址和墓葬的发掘和研究，参加几项地方史、志的编写和编审工作，亦可谓是一件幸事！

本《论集》的文稿，从撰写的时间说，始于1961年，下限至1997年底为止。如《广东早期铁器》一文写于1961年至1962年。铁器的发明和使用，是继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之后，最终能排斥石器工具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产工具。广东何时开始使用和冶铸铁器，是岭南古史上值得探索的一个课题。从目前发现材料看，战国中、晚期已经使用了铁器，如始兴、曲江、封开、深圳等地。本地区的铸铁业，或出现于南越国时期，明确的冶铁业还不甚了了。据文献记载，广州“大开鼓铸”是在晋代。又如“试论西樵山文化”、“百越文化源流”、“中国栽培稻的起源、演变与传播”、“‘朱庐执钁’银印考释”、“广东新石器时代文化及相关问题”等文稿，都是经过数年的积累和琢磨，其中也不乏难言的周折。

本《论集》文稿，若从内容上分，大致有如下几类：第一类是个人参与或主持的重要考古发现的报告，收录这一类文稿意在说明本集文稿的考古资料多是第一手的或与作者有关的发掘资料。第二类是关于考古学与地方史结合的探索。笔者认为，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除了应竭力为建立本地区的考古学年谱以外，还应利用考古资料探索岭南地区的古代历史。岭南地区古代一向被视为蛮夷荒服之地、有关先秦时期的文献史料匮乏，因而探索史前和先秦时期的历史，地下考古资料就显得特别重要。

30多年来，广东发现的先秦墓葬数以百计，各类青铜器已达1200多件，广西也发现500多件，为岭南青铜时代和奴隶制问题的深入讨论提供了一大批实物资料。又如1973年以来，在曲江县石峡遗址发现了上百座“石峡文化”墓葬，为探索广东地区私有制的出现、原始公社的解体过程，提供了典型的实物资料。对于这两大学术课题，我们已在《广东通史》（古代上册）作了比较具体的探索。正如《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上所指出：“作为一门历史科学，考古学的研究不应限于对古代遗迹、遗物的描述和分类，也不应限于鉴定遗迹、遗物的年代和判明它们的用途与制造方法。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阐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又说：“考古学家要论证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要探求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差异点和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由于自然条件、社会背景等的不同，各种文化类型也必然会有自身的特点和自己的具体演变过程。”我觉得，我们的任务应侧重于后者。第三类文稿是关于考古学文化的探讨。如：《试论西樵山文化》（或称“金兰寺一期文化”，或叫别的什么文化，笔者所指的都是珠江三角洲新石器中期、距今五一六千年的区域文化）、《广东新石器时代文化及相关问题探讨》、《“大湾文化”初议》等亦是。如上所说，研究者

古学文化和文化类型，是史前和先秦考古学者的一项基本任务。然而什么是考古学和考古学文化，如何划定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迄今似乎还没有一种被中外考古学家公认的定义。如《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考古学”条目开章明义地说：“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份。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又说：“作为一门近代的科学，考古学有一套完整严密的方法论。它包括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和田野考古学等分支，并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内的许多学科以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达到这个总目标，就必须从最基本的调查发掘工作做起，通过对大量的多种多样的实物资料加以整理、分析，广泛与各种有关学科相结合，经过归纳，加以提高，从理论上阐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什么是考古学文化，如何划定一个考古学文化（含同一文化的不同类型），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和划分方法。但通常以首先发现的遗址地名来命名。进入文明时期以来，有了文字、古城、古国和部族名称等因素；有了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南越文化等。但对一种史前考古学文化应该划定多大的分布范围，则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按《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的说法，所谓考古学文化，是“专门指考古发现中可供人们观察到的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并且具有共同的特征的一群遗存。……一个考古学文化不能由一种特征来划分，因为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找到类似的文化因素。只有许多特征的总合，才能把一个文化和另一个文化划分开来。一个考古学文化包括有不同的文化因素，例如某种特定类型的住宅、墓葬、工具、陶器和装饰品以及某些特定的工艺技术等。每个考古学文化的内容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显示其背后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对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除了要解决时代和分期以外，还要研究其内容、特征、分布范围、起源、发展以及同其他文化联系等。应当特别提到，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与开拓者苏秉琦教授，他1976年提出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论说，是对中国考古学文化的规律性揭示，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基础理论；1980年以来，他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于五千年前，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多元论”和“古文化、古城、古国”和“古国、方国、帝国”的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等理论，都对中国的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苏秉琦先生曾于1975年底至1976年春来广东指导考古工作长达5个多月，他撰写的《石峡文化初论》，他提出的“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的原始文化，以及他提出的“岭南有自己的青铜文化，有自己的‘夏商周’”等论说，都对广东岭南地区的考古学研究有直接和深远的指导意义。如果说我个人在广东（岭南）地区的史前和先秦考古领域作了若干探索，都是在苏秉琦、夏鼐等前辈考古学家理论指导下取得的。

广东（东部沿海区）和香港地区的先秦文物发现和考古学文化探讨发端于1932—1936年，如所谓“舶寮洲（即南丫岛）文化”，海丰的“沙坑文化”等，但都不免打上“中国仰韶文化西来说”的烙印。新中国建立以来，广东的考古调查发掘和发现，获得了重大成果。70年代前后，曾有人提出新石器早期文化——“青塘类型”、“西樵山类型”、“东兴贝丘类型”以及以“夹砂陶”、“软陶”和“硬陶”来区分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至汉代初期的陶器。现在看来都值得重新探讨。然而广东迄今能列入中国史前考古

学文化的，只有“西樵山文化”和“石峡文化”两个。至于珠江三角洲（含港澳地区）以彩陶、白陶、夹砂陶等文化因素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近年来得到了重视和开展过热烈讨论，提出过“金兰寺一期文化”、“大湾文化”等名称。还有分布于粤东地区至闽西南九龙江流域和汀江流域等地的商周青铜文化——“浮滨类型文化”（“浮滨文化”）。本《论集》第四类文稿是关于粤与桂、琼、闽及港澳台考古学文化关系问题。如《试论闽台粤先秦考古学文化关系》、《岭南先秦青铜文化考辨》、《再论岭南先秦青铜文化遗存的年代与分期——兼评“广东青铜时代三个基本问题”》、《从中山龙穴、白水井新发现的彩陶谈起》、《略论粤港“牙璋”及相关器物——夏商周文化南传迹象探微》、《略论粤、港、海南岛的有肩石器和有段石器》、《略论澳门黑沙史前文化与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的关系》、《香港与祖国内地的历史关系》、《海南岛早期居民问题》、《“朱庐执钺”银印考释——兼论朱卢朱崖问题》等，这一类文稿，大多为应邀参加学术研讨会而作。1981年以来，笔者因公六次赴港，并有机会到南丫岛的大湾、赤鯮角岛等处考古现场观摩，还到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香港考古学会、香港博物馆和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等参观出土文物，因而对香港的历史文物有亲切的感性认识，它与广东及祖国内地，关系密切，一脉相承。以上四类文稿中，其探讨的问题都集中在先秦时期、尤其以新石器时代史前考古为重点。这使我回忆起1961年在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制定个人努力目标和专业重点时，曾提出：“立足广东（岭南）、面向全国，兼顾东南亚；以新石器考古为重点”。当时曾把这一设想向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严文明同窗讨教，他来信说，先选定以新石器考古为重点也好，这样，还可以上溯至旧石器时代，下联系及家庭、私有制、阶级、国家和民族的起源形成诸问题。现在回顾起来，以新石器时代为重点方面虽然写了一些文章，但是后面在涉及理论方面的课题则未能探讨，至于旧石器时代考古，本人则基本上未能涉及。事实上，即使是广东——岭南地区的史前考古，也还有许多具体题目值得探讨。如陶器的起源，陶器的种类、特征、纹饰、制法及其演变，石器生产工具的类型、制作及其演变，玉石器的种类、制作及其演变，农业、家畜饲养业的起源和发展，刻划陶文与岭南地区文字的起源和使用问题，岭南先秦时期墓葬形制及其埋葬制度和习俗，广东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区研究，珠江流域古代文明起源问题，以及从考古材料探索百越及其先民文化的分布问题，等等。

“二十世纪是新知不断涌现的时代，也是旧的知识不断瓦解的时代。”“考古学的知识不仅仅是‘证实’的结果，因为对地底的挖掘，总是依赖于人们的解释体系。因此，伴随着考古成果的不断涌现和社会历史的发展，考古学在不断创造‘历史’的同时，也不断地改写‘历史’。总之，考古学既是现代知识体系的有机部分，也是反思现代知识体系的诸多结论的重要途径。”（载《读书》杂志1996年9期）。

苏秉琦教授曾指出，考古学是历史科学，不能只讲重大发现、文物精品的积累和工作流水帐，不能忽视学科本身的理论建树，否则就成了陈谷子烂芝麻。要立足于现在去追溯过去，找活水源头；要立足于现在去展望未来，才有所依据；这样，科学才富有生命力。（见邵望平、汪遵国：《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1993年苏秉琦教授访谈录》）。由此可见，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许多新旧资料要去学习、反思和解释，还有许多新课题，新理论和新知识，要我们去学习和探索。

我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人的能力是微薄的，只有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群策群力，才能取得较大的成果。今天，当我把个集子的文稿重温了一遍，自然发现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深深地感到：“学然后知不足”这一至理名言；同时也有“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发方悔读书迟”（唐人颜真卿语）的感慨。但既然主要是旧作的结集，也就让它一仍其旧，把它看成是个人学术探索道路上认识的纪录和镜子罢。

最后，我要特别提到，中国现代著名考古学家、我的恩师苏秉琦先生在逝世前夕念念不忘为本书作序，国际知名汉学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教授饶宗颐先生为本论集作序，并亲笔题写书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广东省社科联主席张磊教授亦乐于为本书作序；我馆领导十分关心论集的编选、出版工作，并在出版经费上予以支持，还得到本馆许多同事及省考古所的同志的热情协助，使此书得以付梓。在此谨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杨式挺

1997年12月10日

目 录

考古发现与研究	(1)
谈谈佛山河宕遗址的重要发现	(6)
广东封开杏花河两岸古遗址调查与试掘	(19)
广东封开利羊墩古墓群发掘简报	(44)
谈谈石峡发现的栽培稻遗迹	(63)
关于广东早期铁器的若干问题	(70)
试从考古发现探索百越文化源流的若干问题	(81)
建国以来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略述	(92)
从考古发现试探我国栽培稻的起源演变及其传播	(100)
岭南先秦青铜文化考辨	(115)
再论岭南先秦青铜文化遗存的年代与分期 ——兼评《论广东青铜时代三个基本问题》	(124)
略论封开先秦历史文物在岭南的地位	(137)
香港与广东大陆的历史关系	(152)
略论南海早期交通贸易二题	(157)
试论西樵山文化	(165)
广东新石器时代文化及相关问题探讨	(188)
石峡文化类型遗存的内涵分布及其与樊城堆文化 的关系	(217)
从中山龙穴及白水井发现的彩陶谈起	(230)
“大湾文化”初议 ——珠江三角洲考古学文化命名探讨	(248)

广东新石器时代文化与毗邻原始文化的关系	(271)
试论闽台粤先秦考古学文化关系	(282)
浅说粤港“牙璋”及相关器物	
——夏商周文化南传迹象探微	(297)
略论粤、港、海南岛的有肩石器和有段石器	(308)
香港古文化的根在大陆	(318)
略论澳门黑沙史前文化与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的关系	(323)
从考古材料看香港与祖国内地的历史关系	(332)
从考古发现探讨海南岛早期居民问题	(351)
“朱庐执卦”银印考释	
——兼说朱卢朱崖问题	(357)
读饶宗颐教授若干考古学论著感怀	(367)
附录：未选录的文章目录	(380)
后 记	(382)

CONTENTS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and Study of Guangdong	(1)
Excavating and Important Discoveries of Foshan Hedang Site	(6)
Reconnaissance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mains Skirting the Xinghua Stream at Fengkaixian, Guangdong	(19)
A Excavating Report of the Graves of Guangdong Province's Feng Kai Li Yang Dun	(44)
Planting Rice Site Discovered in Sixia	(63)
A Few Problems Concerning Guangdong Early Stage Ironware	(70)
A Few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ai Yue" Culture—As viewed from some Archaeological Finds	(81)
A Brief Account of the Archaeological Studies in the Neolithic Age in Guangdong Province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92)
On the Substanc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Origin of Planting Rice in China	(100)
A Textual Research on Bronze Culture of Pre - Qin Period in South China	(115)
Review on Bronze Age and Period of Pre - Qin in South China —On Three Basic Problems of Guangdong Bronze Age	(124)
A Brief Account of The Place of Feng Kai's Pre - Qin Historical Relics in the South China	(137)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ongkong and Guangdong Mainland	(152)
Two Topics on the Early Trade Communica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	(157)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Siqiaoshan Culture	(165)
A Study on Guangdong Neolithic Culture and Related Problems	(188)
Sixia Style Cultural Site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Fanchengdui Culture	(217)
A Discussion on the Painted Pottery Discovered in Zhongshan Longxue and Bai Shuijing	(230)
A Preliminary Study of "Daiwan Culture" —O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rchaeological Cultural Names	(248)
Guangdong Neolithic Cul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s Neighbours	(271)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Fujian, Taiwan and Guangdong	(282)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Yazhang" of Guangdong and Hongkong and some Related Issues	